

刘志荣 著

张爱玲·鲁迅·沈从文
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



现代文学研究平台系列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鲁迅·沈从文: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刘志荣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
(“薪传”现代文学研究平台系列)
ISBN 978-7-309-09663-7

I. 张… II. 刘… III. ①张爱玲-文学研究-文集②鲁迅-文学研究-文集
③沈从文-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②I210.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2213号

张爱玲·鲁迅·沈从文: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
刘志荣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19 千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663-7/I·753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2006年,教育部批准聘任王德威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领衔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我想说,这是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它对于提升我们学科的品质,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创建一流学科,直接起了推动的力量。

我只想举几个例子,说明德威兄对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2007年春,德威兄到任以后,着手筹备一系列有影响有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2008年6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举办“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教学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和讨论了海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教材建设,这是一个历来被人疏忽、又能够引起许多话题的主题,给人的启发可以想见;10月,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张新颖、张业松、严锋、李楠等教师应邀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参加“呈现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德威兄的精心安排下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理学院等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以集体的形象展示于国际同行的面前;2009年1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3月,哈

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在香港联合举办“中国当代文学 60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岸三地作家王蒙、王安忆、朱天文、北岛、黄春明、严歌苓、平路、钟晓阳等出席了会议，成为香港学术界一件盛事；2010 年 6 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新世纪文学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的哈佛中心和复旦大学举行，邀请了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骆以军等知名作家和一批年轻作家同登讲堂，商量探讨新世纪十年的文学，会上高潮迭起，新见纷纭，直接推动了新世纪文学的研究……这些学术活动都有两岸三地的重要学者、欧美日本的汉学家等参与研讨，而德威兄是这些学术活动的灵魂，从策划主题到组织人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不仅如此，他把长江学者的科研经费完全地奉献出来，用于补贴会议费用和邀请复旦教师出国之用；还不仅如此，每次学术活动中，他都带头发表新的学术论文，以卓越见解引领学术前沿风气……身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讲座教授，两岸三地（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学术论坛上的重要活动家，跨华、英两种语言著述领域新作不断的学者，自身工作的繁忙可以想象，但一旦承诺了复旦大学的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之岗位，就以如此精力投入经营，苦心扶植、提携后学。我作为协助他工作的合作者，愿意把这种感动公布出来，不仅仅是为了表彰，更重要的是，德威兄为当代学术界确立了一种人格风范，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在德威兄的带动下，许多海外的青年学者与复旦的联系也紧密起来，由此展开了多元的校际交流和系际交流，复旦中文系先后与美国的威斯理学院、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等学院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者的往来逐年增多。多年来，复旦中文系一贯执行鼓励研究生外出深造的方针，许多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复

旦学子脱颖而出,他们始终与母校保持了亲密联系,随时交流、参与复旦中文系的各种活动。他们在海外做出的学术贡献,同样也显现了母校的根基培育之果。

这几年里,复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同事们一如既往地发奋著述,在积极展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视野渐宽、新见频发,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三年中,除了个人出版的学术著作以外,我们还先后编辑出版了复旦师生现代文学研究的集体成果《薪传》丛编四种,国家社科项目《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五种,都反映了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整体风貌的学术成果。自德威兄担任了复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以来,我一直想再策划一套新的学术丛书,扩大原来著述范围,以体现跨国合作的广阔视野,反映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新的学术面貌。于是,我冒昧提出一个“平台”的理念。平台一般只是指高于附近区域的平面,一个广阔、但有范围的空间,现在常用在比较抽象的学科建设领域,指的是某种学科发展的空间,如学术机构、学术活动、论坛、刊物,等等,供学术成果的公开发表和展示之用。依我的理解,丛书本身不是平台,而是在德威兄引领风气之下,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空间扩大了,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交流和学术会议,由此又引出新的讨论话题和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整体的学术发展过程都体现了“平台”所展示的实绩。

新的平台丛书目前还只是一个设想,要实现这个设想恐怕还要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不打算事先策划什么主题,只想提供一个平台,吸引更多的著作者来自由加入。作者的队伍有所扩大,不仅仅是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同仁,也包括在复旦中文系学习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包括曾经在复旦中文系学习过、而今在各自岗位从事研究的学者,还包括从复旦到国外去留学攻读学位、而今

在海外高校里工作的学者，也包括在复旦中文系兼任过各类教职、上过系列课程的海外汉学学者，在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来体现复旦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丛书的内容和主题设计方面别无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是新完成的学术著作，而不是旧著的重版或变相重版；时间上也没有特别催促的意思，希望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慢慢地积累数量，渐渐地形成规模。

2007年，在《薪传》丛编出版时，我写过一篇序，文章中说：“希望将‘薪传’作为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称。……传统就是一道水流，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信息，传布开去。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是由前辈学者辛苦开创而成，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其传统，继往开来，代代承传。所以，‘薪传’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关键词。”现在，我把这套平台丛书同样纳入“薪传”系列，也就是想再强调一遍：薪传，是我们的关键词。



2010年11月10日临晨，
写于香港城市大学德智苑

自序

把这些年陆续发表的与张爱玲、鲁迅和沈从文有关的论文和对话略加拣择、编集起来，似乎有做点说明的必要。这三位是我最欣赏的现代中国小说家，之所以喜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丰富而深入的“实感经验”^①。张爱玲写城市、沈从文写乡村、鲁迅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与一般“闭门造车”的作家不同，这一点，不必太敏锐的读者其实也会有非常清楚的感觉。我一点不介意——毋宁说很高兴，在这一点上，和大家一样，完全站在忠于自己的阅读感受这一边。

推崇“实感经验”，也不一定就是推崇“写实”——因为从“实感经验”出发，不但可以有虚构，也完全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写作方法，但推崇“实感经验”，却一定会反对从形形色色的整体理论和教条出发——后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痼疾，现在也不见得完全康复。这种痼疾，不但吞没和宰制了我们的具体经验，也极度束缚了生命本身的自由与活泼，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中华民族的智商和创造力。

重提“实感经验”，说起来，从正式形成想法，到今天也已经有近十年。一开始的想法，可以说比较倾向于“实”，推崇“实感经验”本身的具体、生动、丰富和不可替代；到后来，则越来越倾向于“感”，更为强调精神的敏锐以及经验本身的重要和深入。我所欣赏的这三位作家，各自经历过不完全相同却都非常深刻的精神体

^① 详细解说参拙集《从“实感经验”出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自序”，亦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4期。

验。其中，张爱玲对虚无的揭示，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化和心理危机最为典型的症候；鲁迅很早就非常有类似的感觉，但他更为鲜明的形象，却显然是不被这一体验压垮而持续不断地进行摸索与抗争的精神；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沈从文其实也有过类似的精神体验，也就是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以迄整个四十年代的精神迷乱和危机，这一危机一九四九年前后达到顶点，之后方始渐渐平静和康复——沈从文对“自然”有非常深刻的体验，这导致他能迅速地感应到整个“现代”的核心危机，而他得以从如此深重的精神危机中康复，某种类似道家的精神和态度，可以说起了根本性的作用——时至今日，现代性进程在中国方兴未艾，现代性危机却也已然暴露无遗，沈从文思考和感受的林林总总，今天更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

一边编辑、汇总这些文章，一边发现，这些文章，无意间也反映了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从张爱玲开始，因为有很长时间，思考她的问题，自己也渐渐沉浸在她的世界之中，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解脱这一危机的出路，且似乎根本没有出路似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心力所向，便是绝望般地企图思考和超克这一危机，这个过程，在我对鲁迅和沈从文的讨论中，留下了一些点滴的印记。

鲁迅本是我少年时代就喜爱和熟读的作家，一九九七年之后，跟陈思和老师读博士，因而常去贾植芳先生家走动——因为贾先生的关系，师门之中处处弥漫着源于鲁迅传统的精神空气，影响的事情，说起来，是不知不觉，在师门读书的几年，当年困惑的核心问题仍然未能解决，人却渐渐变得乐观和坚强起来。不过虽说鲁迅是我从小喜爱的作家，但却从未考虑过拿他来做“论”，后来依然是因为种种机缘，方始有了此辑的几篇——写“七月派”的潜在写作的一篇和怀念贾先生的一篇，亦一并收入此辑，既以见精神脉络的延续，也以记来处之不忘。

至于研究起沈从文来，则已然是工作之后，那时研究沈从文的“潜在写作”，发现仅限于《从文家书》，不能说清问题，便把思路

扩展到他的写作全貌，写出来的东西，便是讨论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沈从文心路历程的那篇。张新颖兄此前写过两篇题材类似的文章，这篇文章，便有些和他对话的意思，材料上互相印证之处颇多，我自己的心得大概便是有意识地把沈从文的困惑、思考与海德格尔及中国道家思想比对、印证，无意间得到极大启发，自信也弄清楚了沈从文一直想表达、但一直未说清楚的东西，也由此仿佛明白了现代历史和现代精神的一些关键问题^①。这之后，便正式和张新颖兄做了一次对话，可以说是那段精神历程的总结——也就是此书的最后一篇。

还在读博士的时候，陈思和老师便要我们去听张文江老师讲古典学术，说是要我们知道学问的“天高地厚”；工作之后，还自己跑去听过一学期的《庄子》，之后一直想着还要去听，但也一直惫懒着，直到张老师突然得了重病——所幸后来终于康复起来，但已然是从“生死线”上走了一遭——张老师生病的那段时间，我心上爽然若有所失，等他康复之后再开讲，便继续听他讲古典，这一次态度端正了好多，基本上一次不拉地听下来（当然出国的时候要借助录音）。这些讲课，从一开始就有根本性的启发，有一天听完《庄子·庚桑楚》篇出来，突然发现多年困惑的问题，不知不觉间已如春来冰雪消融。这是二〇〇五年的事，和张新颖兄讨论沈从文，大约已经带着当时的信息——尽管现在看，那篇谈话还立“体”得厉害，应该全部散去。

这之后，读的书，想的问题，便慢慢变了。

过去的形迹，当然不值得眷恋，敝帚自珍，尤其是可笑的事情，不过，这些凌乱的足迹，或者说不定也可以安慰苦恼与寂寞中的行路者于二三：

以前种种做为，

^① 这篇文章在收入《潜在写作：1949—1976》一书时，因为论题集中的原因，删去了几乎一半篇幅，比较关键的第三节几乎全部删去，此次便借机全文完整收入。

好似一场梦呀。
——焉知今日所为，
不也是一场梦呢。

乌云散去，你会看到
无云的晴空。
——何妨也留一点云彩呢，
看它飘摇起落，随卷随舒，
不正显出，天空的蔚蓝？

2012年3月13日，早稻田访学旅次

目 录

自序	1
一、张爱玲：现代虚无体验	1
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	2
传奇与日常：张爱玲小说的双向改造过程	19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 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40
张爱玲与《传奇》 ——一部文学史之一章	68
二、鲁迅：一种抗争精神的延续	81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回忆鲁迅(对话)	82
抗战爆发与鲁迅辞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	109
特殊年代的精神活动：“胡风冤案”受难作家的 潜在写作	128
一些记忆的断片 ——贾植芳先生三年祭	140
三、沈从文：对“现代”的反思	159
从“迷乱”、“疯狂”到“清醒” ——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沈从文的心灵线索	160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对话)	213

一、张爱玲：现代虚无体验

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

在《〈传奇〉再版序》中，张爱玲这样写道：“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①在此，她有意识地把个人的焦虑，与时代“在破坏中”以及文明的将“成为过去”联系起来，并且有意识地引导读者，把后二者形成的“惘惘的威胁”，理解为她自己的焦虑感产生的原因。这后面，其实躁动着她自己隐秘的文化体验——她属于中国现代少数几个具有“末日意识”的作家，而这种文化体验与人生体验的契合，无形中制约了她的文学的发展方向。

—

一九四六年，张爱玲到温州去看避难中的胡兰成。对这次相会，胡兰成在其回忆录中有详尽的记述。最能让人引起兴致的，是他回忆张爱玲看了《圣经》之后的感想：

“这个民族是悲壮的，但也叫人难受。爱玲看到《传道书》，非常惊动，说是从来厌世最彻底的文辞。她念给我听：

* 初稿写成一九八八年，二〇〇〇年发表前进行了删改浓缩，并改今题。

① 本文所引张爱玲原文均据《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以下仅在括号中标明篇名，不再一一注释。

‘金链折断，银罐破裂，日色淡薄，磨坊的声音稀少，人畏高处，路上有惊慌。’又道：‘太阳之下无新事。’以色列亡于埃及四百年，又亡于巴比伦，最后被罗马所灭，而《传道书》则尚在这之前已感人世的飘忽无常，除了投向上帝归宿，人再也没有气力了。”^①

胡兰成的这段叙述大体上应该看作是真实的材料，因为在张爱玲的思想里确实能找到许多地方可以与这里的说法相印证。胡兰成回忆中所引的第一段出自《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显然是凭借记忆来写作这一节的，所以缩略与引错之处不少，引用原文稍作比勘，就会发现张爱玲最不重视的“投向上帝归宿”，如原文中的“当记念你的主”等内容，恰是《传道书》的主旨所在。这是很有意味的忽略，因为《传道书》之所以着力渲染“衰败的日子”，目的正是为了突出信仰的内容——“当记念你的主”。它的目的是劝告人们把信仰作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以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来抵抗世界的虚空。书中所渲染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一切的劳碌，一切作为，“都无益处，都是虚空”，确实是厌世最彻底的文字，但其厌世之彻底，在于其描述的人生在世已无一切喜乐希望，唯有转向上帝。它对此岸绝望，却对彼岸寄予了坚定的希望——认为人的一切都是虚妄的，唯有信仰、依靠上帝是智慧的、不虚妄的。张爱玲不重视这样的内容，可是除掉这一点之后，《传道书》就失去了它要传的“道”，而只剩下对世界与人生空虚的描述与喟叹。当张爱玲忽视了这段话深重的宗教意味，而只对其中提到的衰败的描写感到“非常惊动”时，《传道书》与她的生存体验契合最深之处就只剩下了人生的绝望与空虚。

张爱玲的小说，对于世界与人生的无法消解的深重的虚无与绝望，予以特别的关注。这既是一种生存体验，也是一种文化态度。在生存体验上，她的这种态度的产生，正是因为自己亲身体

^① 胡兰成：《今生今世》，三三书坊1990年版，第429页。

验了那种无法消解的悲剧性感受。张爱玲是否有直接的“文明毁灭”的体验？对此最先使人想到的是她所表现的港战经验。战争经验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本世纪的许多西方文化人来说，两次世界战争使得他们突然之间对人性与文明失去了信心。某种意义上，战争确实是文明的毁灭，至少，是文明部分的毁灭。尤其是世界性战争的发生，正说明了文明的力量经常不足以约束人性中的黑暗面，不能抵抗那种毁灭性的力量，如弗洛伊德与荣格都有对战争的这种后果的估计。在这种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的背景下，港战实在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可是这个小插曲，已经见证了文明部分毁灭的过程。对张爱玲来说，港战过后，她突然体会到时间已然终止，文明的根基已然毁坏，未来是什么样，已经难以把握，此后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炮火的残余。

这种深层感觉存在于张爱玲的大部分文本里，譬如《倾城之恋》中读者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最典型地表现出那种文明毁灭后、人们毫无物质与精神依傍的情境：在夜晚的清醒中，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随着这寒风逝去的都有什么呢？一切。“什么都完了”。文明也完了，甚至对文明的记忆也已失去了：

“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炮火劫余所得到的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

小说里两次出现的“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墙”的意象第一次出现时，就通过它的“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与“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正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对比。“墙”的意象第二次出现，则是在流苏的意识中——正是在战后，流苏在死寂的城市的夜晚，恍然觉得“什么都完了”的时候：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堵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文明毁灭之后，只剩下“无生命”与“虚无”在徜徉，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明白柳原原来所说的“这堵墙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来……”的意思：“地”之所以显得“老”，“天”之所以显得“荒”，就是因为文明不再能赋予其意义，或者“文明”已经毁灭……在这里，张爱玲第一次清晰地描写出她对文明毁灭的体验与想象。

这种体验与想象，其实是一种现代的“末日意识”——这种整个文明世界的难以逃避的“末日”，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以英语世界而论，像艾略特、乔伊斯、劳伦斯、海明威这些很不相同的作家，在其写作中都触及到这个主题。（二战之后，这一主题依然广泛延续。）按照有的研究者的看法：现代西方文化中整体性的末日意识，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一方面基督教传统——如《启示录》中——描述的末日审判前世界毁灭的景象，凝结为西方人心中的“原型意象”；另一方面，“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末日意识’关注的是整个族类、整个文明的命运，因而对人类危机景观的展现具有高屋建瓴的全方位的特征”^①。而在中国传统中，由于儒释道皆有其高深的哲理对这些负面感受进行调节，由于这些传统对生命的本性都有较高的估计，劫难的来临固然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和情绪，却不会导致他们产生整体性的绝望和虚无的感受，唐宋以来儒释道思想的融合，更是形成了某种深入人心的循环论的宇宙观，这使得灾难之中也有希望，困厄之中仍有期待，因之出现了同一位论者所指出的下述情况：“社会的血腥、灾难在（中国）诗人头脑中触发出的……（悲凄、愁怨和绝望的）情感一般并不具有（整体性

^① 王宏图：《文明末日劫难前的颤栗：中西文学末日意识比较小札》，收入其论文集《快乐的随涂随抹》，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